

# 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结构性张力 ——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

华子琪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31日

## 摘 要

当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并存的矛盾态势, 并成为重要的民生议题。文章以马克思资本积累与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为核心分析工具, 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 对该矛盾的生成逻辑与成因进行系统性阐释。研究发现, 资本积累作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本有机构成持续提高, 是推动劳动力需求结构深刻调整的重要动因;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现实需求, 导致大量毕业生成为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 而企业对技能型劳动力再生产投入不足, 则加剧了技能人才供给短缺。这种供需错配并非劳动力总量失衡, 而是产业转型进程中供需结构适配不畅的阶段性表现, 是劳动力需求侧与劳动力供给侧脱节的结果。基于此, 文章提出, 缓解该矛盾需立足实际情况, 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强化企业培训主体责任、完善政府就业服务体系, 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再生产体系, 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结构性适配。

## 关键词

资本积累, 相对过剩人口, 就业难, 用工荒, 供需错配

# The Structural Tension between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Labor Shortages in China's Labor Market

##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Ziqi Hua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May 14, 2026; accepted: July 23, 2026; published: July 31, 2026

文章引用: 华子琪. 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结构性张力[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7): 724-732.  
DOI: 10.12677/ass.2026.157621

##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s labor market features a paradox: college graduates fac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while enterprises suffer from labor shortages, which has become a prominent livelihood issue. Adop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paradigm and taking Marx's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as core analytical tool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this contradi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capital accumulation-driv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ri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are core drivers of profound restructuring in labor demand. The lag of higher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behind practical demands renders many graduates a potential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while insufficient corporate investment in the reproduction of skilled labor power further exacerbates skilled worker shortages. This supply-demand mismatch is not an aggregate labor imbalance, but a phased manifestation of structural maladaptation ami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temming from a disconnect between labor demand and supply. According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alleviating the contradiction must proceed from actual conditions: advancing education supply-side reforms,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r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so as to build a labor reproduction system compatible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tructural adaptation between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 Keywords

Capital Accumulation,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Employment Difficulty, Labor Shortage, Supply-Demand Mismatc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20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1]。自2022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连续四年突破千万,劳动力市场迎来大规模增量供给,但用工短缺与就业困难并存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矛盾并非总量失衡,而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产业转型期的具体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 p. 726)。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革关键期,传统产业转型排斥低技能岗位,新兴产业对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刚性需求;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资本积累步伐,大量毕业生因技能错配无法被有效吸纳,转化为相对过剩人口,而资本逐利性又导致技能型劳动力再生产投入不足,进一步加剧用工荒。

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错配的问题,学界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格局。彭树宏(2019)利用众数自评法,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较低,过度教育问题相当突出的结论[3]。李勇等学者(2021)认为垄断行业 TFP 越低,资本错配便越严重,竞争行业的过度教育水平也越高[4]。刘云波(2021)指出学校教育质量对劳动者技能不足的发生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5]。赖德胜、关棋月(2023)从零工经济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出发,分析了零工经济劳动力市场内部不同类型的零工经济特点及劳动关系的差异问题[6]。

上述研究在揭示资本错配、技能错配及劳动形态变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照，但既有研究多立足于市场配置效率、产业组织优化或教育供给改进等维度，对资本积累这一过程与劳动力价值变动之间的内在张力关注存在不足。基于此，本文尝试回到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经典视角，将教育失配、技能错配与劳动零工化置于资本积累动态中加以理解，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在相对过剩人口规律作用下，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究竟如何生成？其缓解路径又指向何方？对此，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形成过程，并结合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探讨相应的制度调适方向，以期在当前就业政策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 2. 理论基石：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其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构成，是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的经典工具。该理论并非单纯阐释劳动力数量的过剩，而是揭示资本增殖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动，厘清了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前提、形成的机理与存在的形态，回答了资本积累过程中为何会出现劳动力与资本需求的结构性错配这一核心问题。

### 2.1. 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成前提：资本积累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相对过剩人口并非偶然形成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根本基础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规律，即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必然提升。二者的联动发展构成了相对过剩人口出现的核心前置条件。

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就是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2], p. 668)，即剩余价值不断向资本转化的过程。资本的扩张动力根植于对价值增殖的持续追逐，生产活动以剩余价值生产而非使用价值占有作为核心目标。就资本构成而言，马克思将由技术构成决定且反映其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定义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积累的显著趋势在于，伴随资本规模扩张与技术革新，生产效率持续提升，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虽在量上表现为资本总额的增长，但“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2], p. 725)。在这一进程中，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力呈现增长态势，从而构成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物质根基。由此，资本积累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必然生产出超过资本增殖平均需要的过剩工人人口。

### 2.2. 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机理：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导致劳动力需求的相对萎缩

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抬升，改变了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比例，由此不断衍生出相对于资本增殖需要而过剩的劳动力。这一趋势并非市场短期波动，而是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产业资本深化与劳动过程变革之间张力的客观呈现。

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就业规模的同比例增长。即便就业总量在绝对数值上有所增加，只要其增速落后于资本积累速度，相对过剩状态便会客观形成。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呈绝对减少和相对减少趋势，形成相对剩余人口[7]。一方面，“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2], p. 495)。另一方面，机器制造业自身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特定阶段，替代效应往往强于吸纳效应，技术进步在总体上仍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收缩。从资本价值构成来看，雇佣劳动的规模并不受制于资本总额的扩张幅度，而是取决于预付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份额的量。伴随资本积累的推进，不变资本份额持续扩张，可变资本份额相应下降，且这种下降呈递增态势。换言之，资本积累越是深化，劳动力需求相对于资本总量的缺口便越是扩大。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成由此获得坚实的机制支撑。

## 2.3. 相对过剩人口的三种经典形式

马克思依据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和生成机制, 将其区分为三种经典类型, 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相对过剩人口的完整图景。

第一, 流动的过剩人口。在现代工业中心, “工人时而被排斥, 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 ([2], p. 738)。这种周期性波动并非源于个体选择, 而是资本积累扩张与收缩的产物。第二, 潜在的过剩人口。在传统农业部门中, 随着产业资本向传统领域渗透,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逐步形成等待向现代产业部门转移的潜在劳动力供给。这部分劳动力始终准备着进入城市现代产业劳动者群体, 在市场条件有利时实现职业转化。一旦工业扩张, 他们便迅速被吸纳, 但始终处于不稳定的边缘。第三, 停滞的过剩人口。这部分人口“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 ([2], p. 740), 其突出特征在于就业极不稳定、劳动时长居高不下却仅能获取最低报酬。在马克思看来, 他们是资本积累的直接牺牲者, 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处境最为艰难的劳动者。

## 3. 现象呈现：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图景

本章聚焦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 系统呈现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图景。结合理论中流动的、潜在的、停滞的三种过剩人口形态, 对应剖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三类典型现象。

### 3.1. 潜在的过剩人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规模与结构

自上世纪末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实施以来, 高校招生规模已持续扩大二十余载。高等教育的稳步推进, 既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诉求, 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但与之相伴的是高校毕业生供给规模的急剧扩张, 使得劳动力市场中高校毕业生群体的潜在过剩特征日益凸显, 就业难问题从局部现象逐渐演变为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性难题。目前在我国, 隐性失业人口分为城镇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三类[8]。其中高校毕业生群体作为隐性失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潜在过剩特征较为典型, 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对象。

从市场需求侧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大量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 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已达每万名工人470台, 位居全球第三, 较2022年的402台增长16.9%, 四年内翻了一番[9]。以福耀玻璃为例, 其福建福清智能生产基地工业机器人密度高达每万人743台, 相当于国内平均水平的两倍。该基地投资32.5亿元的生产线直接催生了约3000个就业岗位。面对新增岗位对技能要求显著提升的局面, 福耀与职业院校合作的“福耀产业班”、“订单班”2023至2025年累计输送产业技工仅200余人, 相对于企业实际的技能人才需求明显不足[10]。这足以见得企业急需复合型人才而不可得, 大量毕业生却因技能脱节难以进入这些岗位, 形成有岗无人与有人无岗并存的困境。这种技能需求升级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断层, 正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重塑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微观体现。

就供给端而言, 高校所输送毕业生的专业布局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离。最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影响下的劳动力市场求职错配情况报告》显示, 基于2021年1月至2025年7月超162万条匹配数据, 近六成求职者存在“纵向错配”, 即岗位学历要求低于求职者实际学历。而近45%的大专及以上求职者匹配了专业不对口的岗位, 即存在“横向错配”, 且2021年至2025年间, 横向错配比例从40.7%持续攀升至49.3% [11]。这意味着大量毕业生面临双重困境: 一方面因学历“过高”而被排斥在适配岗位之外, 另一方面因专业背景与资本需求脱节而被迫跨行业就业或陷入待业。而马克思所指的潜在过剩人口, 虽在经典语境中以农业过剩劳动力为主要对象, 但其理论本质是因生产方式变革而暂未被资本吸纳、处于等待转移状态的劳动力储



备。从这一核心规定性来看，当代高校毕业生因技能与需求错位而形成的待业状态，也是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体现。

### 3.2. 流动的过剩人口：企业用工荒背后的裁员与再招聘

与高校毕业生的潜在状态不同，在产业升级与技术变革中不断被排斥又吸纳的劳动力群体，呈现出典型的流动过剩人口特征。他们在工业周期和技术迭代中被反复替代，完美契合马克思所界定的流动过剩人口核心内涵。

首先是制造业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尤其是高端制造、数字化人才领域。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0 年制造业单位就业人员为 3806 万人，与 2016 年相比，占全部从业人员(不含农业)的比重下降了 5.02 个百分点[12]。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制造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却在不断走高。这意味着，一边是制造业从业人数的总量下降，另一边却是技能人才缺口的急剧扩大，这种一将难求与一兵难留并存的局面，正是流动过剩人口特征的表现。同时，制造业零工化趋势日益显著，进一步印证了流动过剩人口的存在形态。企业会通过零工经济这种用工方式，将市场波动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在吸纳 - 排斥的循环中处于不稳定状态。

其次，服务业用工短缺同样呈现结构性特征。2024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相关工作部署中指出，要进一步释放养老、家政、现代物流等社会服务行业的就业潜力。然而，这些岗位往往劳动强度大、薪资水平低、发展空间有限，难以稳定吸纳劳动力。以广东省为例，截至 2025 年 8 月，全省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达 4.7 万人，其中养老护理员 2.36 万人，照护服务人才总量仍有较大缺口；另一方面，现有护理人员存在年龄偏大、专业技能不足等问题，而护理职业社会认同度低、劳动强度与薪酬待遇不匹配，导致高素质、专业化年轻人才不愿入行，人员结构性矛盾突出[13]。同时，随着智能制造推进，传统制造业中的低技能岗位持续萎缩，大量被排斥的劳动者被迫向服务业转移。这些劳动者与服务业中高要求、低保障的岗位之间，形成了流动循环：劳动者不断尝试进入、又不断退出，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

用工荒的结构性特征表明，这不是劳动力总量的短缺，而是特定技能的短缺。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性调整。而这种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并存的局面，正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

### 3.3. 停滞的过剩人口：零工经济中的边缘劳动者

在潜在与流动之外，还有一类劳动者处于就业最不稳定的边缘状态，构成了当代的停滞过剩人口。即零工经济中的非正规就业群体。

供需错配与产业转型的双重挤压，使得大量劳动力被挤入零工经济领域。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21 年，我国灵活就业的人口规模达到了 2 亿人次[14]。部分高校毕业生因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也被迫加入这一群体，从事与专业无关的临时性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停滞过剩人口的规模。另外，企业为压缩用工成本，普遍采取灵活用工、劳务外包等用工形式。这种就业形式极不规则，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正是马克思对停滞过剩人口描述的现实映照，也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力被不断边缘化的直接体现。

区域发展不均衡与劳动力流动障碍，则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停滞状态。劳动力持续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则面临引不进、留不住人的困境。地域锁定与就业锁定相互叠加，使边缘劳动者难以通过空间流动实现稳定就业，始终被束缚在过剩人口的停滞形态中。

停滞的过剩人口印证了马克思揭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差异化分布：劳动力市场中既有等待吸纳的潜在者、反复面临岗位被替代的流动者，也有长期处于就业底层的停滞者。三类过剩人口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图景。

## 4. 理论解释：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供需错配机制

当前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三类过剩人口的存在，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力供需错配的集中表现。这种错配源于产业转型、劳动力供给调整与市场机制不畅的叠加，本节从产业需求、劳动力供给与市场机制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 4.1. 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生产资料对于活劳动的扩张呈现客观趋势。产业主体为提升市场竞争力，加速技术迭代与设备更新，扩大不变资本投入规模，相应降低活劳动投入比重。这一趋势并非抽象理论推演，而是当代中国产业升级的现实写照：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转型，恰恰反映了资本积累进入了新的阶段。

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重塑了劳动力需求逻辑：高技能、复合型劳动力成为资本高效增殖的必要条件，而低技能劳动者因无法适配技术升级后的生产模式而被替代。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这种需求分化形成了吸纳与替代并存的格局。这一差异是供需适配困境的重要成因，也为三类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成提供了需求侧理论基础。

### 4.2. 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与过剩人口生成

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与劳动力再生产理论表明，过剩人口的形成源于双重机制：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排斥，以及劳动力再生产滞后于资本积累需求。资本有机构成提升要求劳动力供给同步升级，再生产一旦滞后，便引发技能失配与过剩，我国三类相对过剩人口正是在此逻辑下生成。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资本积累要求，这是高校毕业生成为潜在的过剩人口的重要原因。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2006年中国就业人口中仅有6.63%接受过高等教育，2015年则上升至17.40%。而2006年高等教育人口从事高技能工作的比例高达84.92%，2015年则下降至54.13% [15]。可见高校人才培养并未跟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实现技能结构升级，导致大量高学历劳动者虽具备劳动能力与就业意愿，却无法被现代产业资本有效吸纳，扩招所形成的人力资本难以转化为资本增殖所需的劳动力，只能处于等待吸纳的储备状态，成为典型的潜在过剩人口。

在成本收益约束下，大多企业将技能培训支出转嫁给社会系统，自身仅承担用工环节而弱化人力资本培育职能。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体系的课程更新与产业技术演进之间存在时滞，所输送的人才在技能结构上难以匹配产业升级的实时需求。再生产不足导致高技能短缺与低技能过剩并存，用工荒与就业难由此叠加。

### 4.3. 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不畅与供需错配固化

资本积累理论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匹配是资本增殖和过剩人口调节的前提。一旦市场分割、流动障碍与信息失灵阻断自由交换，错配便无法自发修正，从阶段性矛盾固化为长期稳态，持续锁定三类相对过剩人口。

资本积累的空间不均衡会造成劳动力市场区域分割。资本会自发向利润率更高、产业更集中的区域流动，在我国表现为东部资本密集、需求旺盛，中西部积累不足、吸纳有限。这种空间分化迫使劳动力单向流动，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与区域差距形成市场壁垒，劳动力无法与资本同步配置，造成东部过剩与短缺并存、中西部外流与空缺并存的错配格局。

制度性约束可能会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对缓解停滞状态构成一定压力。我国户籍制度制约了劳动力空间流动[16]。在社会福利分配与户籍身份直接绑定的情况下，非户籍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工

资收入、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都难以享受与城镇劳动力平等的待遇[17]。这也会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使跨区域劳动者难以融入流入地正规就业体系,长期滞留于零工市场与低端劳务市场,无法通过空间流动实现技能提升与岗位匹配,被锁定在低质量、不稳定的就业状态。

信息不对称则导致劳动力-资本匹配失灵。招聘平台与中介机构的信息偏差,使企业难以找到适配技能的劳动者,劳动者也无法对接真实岗位需求。潜在过剩人口无法及时吸纳、流动过剩人口难以稳定就业、停滞过剩人口无法跃升,三类形态相互强化,最终使供需错配成为市场难以自发修复的困境。

#### 4.4. 中国语境下资本积累理论的适用性辨析

需要指出的是,将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运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析,并非简单套用资本主义批判框架,而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运行逻辑的客观看察。

首先,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企业虽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但在市场竞争中仍需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技术革新与设备升级同样是其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并未因所有制性质而改变。其次,从政府调控看,就业优先政策、教育供给侧改革等干预措施,深层来看是对资本积累负面效应的事后调节,而非事前替代。这些政策可以通过调整人才培养结构等方式,缓解供需错配的短期烈度,或延缓低技能岗位的淘汰速度。但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企业追求技术进步、以机器设备替代人工劳动的内在倾向,因此也无法彻底消除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萎缩这一问题。最后,从劳动力商品化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很大程度上由市场主导,劳动力作为商品自由流动的特征日益显著,这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成提供了前提。虽然户籍等壁垒仍未完全消除,但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刚性约束已较之前大为弱化。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并非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例外,而是该过程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具体表现。政府干预与国有资本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但无法取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致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分化。这正是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的理论适用性所在。

### 5. 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的缓解路径

在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催生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困境,这与劳动力再生产体系与产业技术升级需求之间的衔接不畅有直接联系。缓解这一困境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而需立足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推动教育、企业、政府多元主体协同,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再生产体系。

#### 5.1. 教育供给侧改革：从规模增减到内涵适配

前文分析表明,高校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技术升级,是潜在过剩人口持续生成的关键诱因。因此,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不在于规模增减,而在于培养内涵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适配。

当前,市场逻辑正在推动一场深刻的专业结构重组。近十年累计撤销专业点约1万个,清理进程自2018年起明显加快,2023~2024年撤销数量占总量的60%,公共事业管理、广告学等专业因就业率低迷而被大范围清理[18]。然而,部分专业并非社会不再需要,而是高校培养内容滞后于产业形态变革,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未能及时回应岗位能力要求的迭代。与此同时,面对人工智能等热门概念的吸引力,部分高校将其视为争夺生源、提升学校关注度的快捷途径,甚至作为缓解招生压力的手段。在缺乏充分论证、师资储备不足等情况下,便匆忙申报并开设新专业[18]。这暴露出了专业调整中市场化导向的偏差:撤销端因短期信号而过度收缩,扩张端因追逐热点而盲目跟风,二者均偏离了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



因此,专业调整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减专业数量,而在于优化专业培养内涵,推动课程内容、实践教学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实现从“专业名称调整”向“培养能力升级”的转变。所以,教育供给侧改革需在回应市场需求与坚守教育规律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因短期波动而过度收缩基础学科,也要防止因追逐热点而稀释培养质量。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看,这正是消解相对过剩人口、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根本前提。

## 5.2. 企业主体责任的回归：从低技能依赖到技能型再生产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分化,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刚性需求与技能型劳动力再生产投入不足之间的落差,既加剧了用工荒,也使低技能劳动者沉淀为流动过剩人口。因此,企业应将技能培训纳入核心经营环节,切实提升资源投入强度。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降低企业培训成本,激发参与积极性,推动企业从再生产成本外部化转向技能投资内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依靠税收优惠等激励手段,仍是以企业短期成本收益考量为前提的柔性引导,约束力仍有不足。德国“双元制”经验表明,真正有效的企业技能投资依赖于更具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培训义务与经费投入比例,将技能培训从可选择的福利转化为必须履行的责任。建立行业工会与企业协商机制,以集体谈判确定培训标准与认证体系,形成劳资双方对技能质量的共同治理;同时以资格证书与晋升通道挂钩,使技能积累成为劳动者获得稳定就业与体面收入的制度性前提,而非企业可随意裁量的“恩惠”。由此,企业方能超越短期成本收益考量,将劳动力再生产真正内嵌于资本积累的长期循环之中,消解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成机制。

## 5.3. 政府角色的强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零工经济扩张使劳动关系突破传统雇佣边界,养老、医疗与职业培训等再生产成本大量转由个体承担,传统就业服务体系因以标准雇佣为制度预设而面临覆盖盲区。政府角色的强化并非简单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而是推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从纯粹市场机制中再嵌入社会保护网络。

在零工经济领域,政府明确平台企业用工责任边界,将算法管理、收入保障等纳入劳动监察范围,防止市场主体通过技术中介弱化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分担。在信息整合层面,需打通人社、工信等部门的就业数据壁垒,降低劳动者跨平台流动中的搜寻成本,而非仅追求技术平台的物理整合。在监测预警层面,建立与产业升级联动的劳动力市场动态监测机制,追踪技术替代带来的传统岗位消亡与新兴岗位创造,对潜在过剩人口集聚区域及时发布预警,为教育供给调整提供前瞻性数据支撑。在能力培育层面,将就业服务从“岗位匹配”前移至技能转岗,针对被技术替代的低技能劳动者与长期游离于正规就业之外的停滞过剩人口,建立与失业保险、社会救助衔接的培训通道,使就业服务成为劳动力跨部门流转的制度性支撑,缓解停滞过剩人口的就业困境。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EB/OL]. 2024-09-1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6470.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9/content_6976470.htm), 2026-06-23.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彭树宏. 中国教育-工作匹配现状及其影响效应[J]. 劳动经济研究, 2019, 7(5): 78-104.
- [4] 李勇,焦晶,马芬芬. 行业垄断、资本错配与过度教育[J]. 经济学动态, 2021(6): 113-127.
- [5] 刘云波. 接受职业教育对降低技能错配发生率的影响[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8): 77-86.
- [6] 赖德胜,关棋月. 零工经济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关系差异性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23(1): 66-75.
- [7] 于洪军,刘金凤.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视阈下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 2011(1): 118-121.



- [8] 于建嵘. 中国隐性失业问题隐忧[J]. 人民论坛, 2016(3): 80-81.
- [9]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IFR) (2024) Global Robot Density in Factories Doubled in Seven Years. <https://ifr.org/ifr-press-releases/news/global-robot-density-in-factories-doubled-in-seven-years>
- [10] 徐康辉. “智造”就业新前景——福耀玻璃以创新实践书写稳就业答卷[N]. 人民政协报, 2025-07-03(2).
- [1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智联招聘.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影响下的劳动力市场求职错配情况报告[EB/OL]. 2025-12-22. <https://nsd.pku.edu.cn/xzyj/cbw/yjbqxl/9295ba3c7e5c4a24aaf57798c94cb1a2.htm>, 2026-06-23.
- [12] 高中华, 贺俊. 制造业人才结构性错配的形成逻辑及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破解思路[J]. 产经评论, 2023, 14(1): 5-12.
- [13] 关于构建多层次长护险体, 破解失能老人照护难题的提案[EB/OL]. 2026-01-27. [https://www.gdszx.gov.cn/zxhy/qthy/2026/dhzhk/wyta/content/post\\_40992.html](https://www.gdszx.gov.cn/zxhy/qthy/2026/dhzhk/wyta/content/post_40992.html), 2026-06-23.
- [14] 于莹. 共享经济用工关系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以认识当前“共享经济”的语域为起点[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21(3): 49-60.
- [15] 蒋帆, 张学志. 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者技能失配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5): 96-109+128.
- [16] 马慧, 靳庆鲁. 户籍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成本粘性[J]. 会计研究, 2024(2): 125-137.
- [17] 王美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5): 36-46+205.
- [18] 郭卉. 新技术背景下的本科专业调整: 近十年变迁、隐忧与应对[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25(9): 67-76.